

地狱绝杀

当关东军遇上 苏联红军

关河五十州 作品

《一寸河山一寸血》作者最新力作

“二”
朱可夫 梦?

中国出版集团

现代出版社

地狱绝杀

当关东军遇上 苏联红军

关河五十州^{作品}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狱绝杀：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/ 关河五十州著. —北京：
现代出版社，2013.6

ISBN 978-7-5143-1517-2

I. ①地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5486号

地狱绝杀：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

作 者 关河五十州
责任编辑 张 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7.25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517-2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 录

- 第一章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//001
- 第二章 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 //031
- 第三章 距离不是产生美 //061
- 第四章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//089
- 第五章 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//115
- 第六章 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//145
- 第七章 不幸的穿越 //177
- 第八章 还能活多久 //201
- 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 //227

第一章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

当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接到交涉训令时，苏军已经登上了张鼓峰。

张鼓峰位于中朝苏三国边境，因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，因此又名刀山。它的海拔仅有一百多米，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这座不起眼的小丘陵却被迅速推到风口浪尖。

围绕张鼓峰的归属，“满洲国”和苏联展开了激烈争执。“满洲国”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木偶，在后面拎着线操控的是日本。日本依据清末时的中俄条约，认为张鼓峰整个属于“满洲国”，国境线应在山峰的东面。

都是板上钉钉、无可辩驳的事实，可是事实有时就是政客们手里烙的大饼，想怎么翻就怎么翻。同是一份条约，苏联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，他们在俄文文本上要了花样，并且拿着这份文本，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境线应在张鼓峰的峰巅，也就是各据一半。

起先大家只是打嘴仗，不久之后，因为一个苏联人的叛逃，嘴仗终于有了演变成大阵仗的可能。

这个苏联人名叫留希科夫，身份为克格勃远东区部长。他以视察为名，越过边境逃亡到了“满洲国”。日本方面不仅大肆宣传，专门为此刊出号外，登载《留希科夫亡命记》等文章，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，敲锣打鼓地把留希科夫迎进了日本国内。

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，他的反水，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。

1938 年 7 月 7 日，日本参谋本部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一份密电，内容是苏军将向张鼓峰一带部署兵力。日方由此判断，这是留希科夫叛逃后，苏联重新调整边

防部署的一个前兆。

果不其然，7月9日，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，挖出战壕，拉起铁丝网。两天后，张鼓峰上的苏军增至四十人左右。

苏方的边防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，情报提供者是德国人佐尔格。

火力试探

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和德国驻日使馆顾问，但他实际上是苏联间谍，并被称为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之一。

佐尔格作为柏林特别调查组的成员，参加了对留希科夫的秘密审讯，审讯一结束，他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：“熊已被解剖，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。”

莫斯科接到电文，便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部署情况完整地吐露给了日方，于是立即着手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，其中，占领张鼓峰并以张鼓峰为战略据点，便是这一调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此前苏军从未单方面向张鼓峰派过一兵一卒，这一动向足以对日本人的神经造成刺激，日本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更是运用了（苏军）“侵入满洲领土”、“占据军事要地”等触目惊心的字眼。

1938年7月15日，日本国境守备队的几名士兵化装成朝鲜族农民，偷偷地登上张鼓峰的几座山头，分头绘制苏军边境军事设施图。苏军发现后，立即开枪射击，一名叫松岛的士兵当场中弹毙命。

事情闹大了，重光葵被匆匆召唤出场。

战乱年代，外交官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重光葵从前是驻华公使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会战结束前，他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朝鲜刺客的一颗炸弹炸成重伤，差点因此丢了小命。

尚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状态，重光葵就伏在床头签下了有关停战协定的一堆文件，签完之后才进手术室。手术结束，重光葵告别了他的一条腿，成了拄着拐杖走路的瘸子。

中国生涯固然不乏凶险，可跟在莫斯科的日子一比，还算是轻松的。由于国力对比悬殊，在跟中国人谈判时，重光葵始终处于主动地位，而这种感觉，苏联外交官绝对不可能恩赐给他。

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，以松岛之死为由，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。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，说松岛“侵犯苏联领土”，咎由自取，死了等于白死。

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，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，提出“退一步说”——退一步说，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，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，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，然后商定国界。

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，他并不打算“退一步”。

重光葵急了起来：“必须恢复原状，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。”

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。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板：“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！”

重光葵铩羽而归，东京炸开了。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，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，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，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

莫斯科吓不倒，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？

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起头喊了一嗓子：打！

稻田所谓的打，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，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。在稻田看来，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，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，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，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，有多大威胁，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。

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，就能解出这道题，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。

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“某一地点”。因为地形所限，这里兵力

最多也只能用到三至四个师团，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。即便搞糟了，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，再糟一点，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。

还要再糟一点——不可能再糟下去了，张鼓峰西面还有图们江作为屏障，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。

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，还有好的方面。想想看，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，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，更重要的是，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，到那时，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。

稻田“打打看看”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，仍然来自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。

没有苏联的肃反运动，留希科夫不会被刮来东京。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，留希科夫同时也是远东地区肃反工作的总负责人。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，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，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。

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，提醒他“注意安全”，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，于是慌忙出逃。

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，可见肃反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。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：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，最后门没有被敲响，他们惊喜地发现，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。

经过肃反，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，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，稻田认为，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。

稻田一言既出，作战课掌声雷动。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，瞬间都像稻田一样，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，马上手握键盘，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。

“稻田计划”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（二者合称军部）高层的兴趣。

1938年7月16日，参谋本部向“朝鲜军”下达命令，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。

“朝鲜军”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，具体来说就是第19、20两师团。第20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，“朝鲜军”只有第19师团可以调遣。

第19师团成立于1915年，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，属于常设老师团，训练素质很高，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。尽管如此，“朝鲜军”司令官中

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，他将第19师团集结于图们江，但严禁其擅自出战。

从“朝鲜军”司令部到第19师团，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。

最后一道关

针对“稻田计划”，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。外务大臣（外相）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，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，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。

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，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。

这个人是海军大臣（海相）米内光政。米内担心，武汉会战在即，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，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，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，万一再同苏联开战，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。

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：放心，苏联不会动手，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，所以才要打这一仗，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。

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，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。

据史学家研究，武汉会战前，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，也就是说，战争消耗和生产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，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。

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，只剩最后一道关了。

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，让军部意想不到的，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。

在张鼓峰行使武力，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，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。

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，关系自然非同一般，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

了个招呼：“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（张鼓峰）。”

见裕仁没反应，载仁察言观色，赶紧补上一句：“陛下如不批准，当然不能行动。”

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、内大臣汤浅仓平，问他怎么看，汤浅直言不讳：“从大局来看，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。”

裕仁沉吟半晌，忽然问：“即使我不同意，他们（军部）仍要独断专行，怎么办？”

汤浅的回答是：“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。若引起对苏战争，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，实在令人担忧。”

裕仁恨恨地说：“大概不到这种地步，陆军是不会醒悟的。”

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，显得很忧虑。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，陆军全是他的部下，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，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，实在是不负责任。

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：“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。对陛下来说，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。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，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，他最好辞职！”

西园寺是三朝重臣，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，就享誉朝野，虽已不当政，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，所以当陆军大臣（陆相）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总长载仁亲王，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，裕仁不予接见。

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，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，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，给给面子，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、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，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，却常常被陆军绕开。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，内心感到很是恼怒，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，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，唯命是从。

裕仁没有露脸，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，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：“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，朕不想批准，也不必为此觐见。”

一听这话，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。

1938年7月20日，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，天皇心里舒服了，这才答应接见。

见面时，裕仁当场问道：“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？”

板垣顺口答道：“外务大臣、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。”

板垣是在扯谎，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。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整天坐在家里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，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。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，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张鼓峰行使武力，于是大为震怒，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：“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！”

板垣、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，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。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：“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‘满洲事变’的柳条沟（指九一八事变）也好，这事件之前的卢沟桥（指七七事变）的做法也好，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，在当地独断专行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，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……”

裕仁摆出陈年老账，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，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。其实所谓统帅权，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，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作出决定，有时故意放松，有时又格外收紧，比如“九一八”前，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“独断专行”的气氛，但他想从中渔利，便故意放松统帅权。到七七事变也一样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日本陆军的“独断专行”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。

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妈妈，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，让他左右为难，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，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。

裕仁最后扔下话来：“今后没有朕的命令，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。”

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，十分惶恐，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。

军部大臣举足轻重，可不是一般角色。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：“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……”

陆军省方面，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。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：“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。”

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，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，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。

经过这番折腾，“稻田计划”算是彻底夭折了。军部声明：“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，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”

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19师团。第19师团枕戈待旦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，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。

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

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，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“荣耀的第十六期”，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、土肥原贤二、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。

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，尾高向来自命不凡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，有那心也没那机会。

同属“朝鲜军”，第20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，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，第19师团不一样，它有一个固定任务，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，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。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，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，等于哪也去不了。

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？鬼才知道。第19师团自成立后，一次都没有出动过。尾高上任后，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，他常对此抱怨不已，多次请求“朝鲜军”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，以便增加师团的“光荣传统”。

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，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，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

闷吗？

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，由于实在找不到“立功”的机会，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。

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，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。1931年10月，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，建立军人内阁。长勇赫然就在其中，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，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，乃“警视厅总监”。

政变不幸中途流产，沦为“十月事件”，长勇受到审查，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，下放到了部队。

又如田中隆吉，没他煽风点火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。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，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，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，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，焚烧工厂，无所不为。之后的绥远战役，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、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。

长勇、田中都在第19师团，前者为步兵联队长，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，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，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。

可以这样说，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。这群渣渣聚一堆，就跟干柴似的，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。

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，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，问题在于，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。

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、载仁这些军队高层，所谓“既得利益者”，做什么都瞻前顾后，现在既遭天皇斥责，差点丢掉乌纱帽，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。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冒险就有机会，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。

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，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。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，闲话一大堆，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。

论据之一，不打仗还能成名，此事古难全。第19师团长驻朝鲜，缺少实战

经验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，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，从而一夜成名，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。

论据之二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，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。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，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，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“坏到不像人”，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，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，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。

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，所以稻田的“坏”不是指缺点，而是优点。别人说尾高鲁莽，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，敢作敢当，乃最宝贵的“纯武人性格”。对尾高以下的长勇、田中、佐藤，稻田也是赞不绝口，称为豪气干云。

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，可惜上面不屑一顾。比如板垣，当初就是靠策划“九一八”冒险上位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，无非“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”，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。

板垣属于过来人，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：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，钻石恒久远，多了不值钱，第一个冒险成功了，不等于第二个、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。

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，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，效果却完全两样。

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，把前后经过，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，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。尾高如遇知音，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。

按照“朝鲜军”中村司令官的命令，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，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，一直拖到7月29日，实在拖不下去了，他才被迫下令撤兵。

主力走了，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，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就在这天早上，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，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。

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，高度尚不及张鼓峰，但张

鼓峰属于“界限不明地区”，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“满洲国”领土。

尾高眼前一亮，立刻来了精神：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干它！

边斩边奏

中村在下令第19师团回撤时，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，以加强国境守备队。尾高便以此为由，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，他下令守备队出兵，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。

当天下午，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，分路向沙草峰进击。沙草峰上的苏军一看这么多日本兵涌了过来，赶紧溜之大吉。

守备队完成任务后，即返回驻地进行监视。隔了一个半小时，又有八十名苏联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了沙草峰。

阵势越来越大，守备队不敢再随意进击，双方形成对峙，你望我、我望你地僵持到了晚上。

那边厢，“朝鲜军”司令部已接到尾高的报告。中村及其幕僚们熬了一整夜，推敲来推敲去，迟迟难以作出决断。到30日凌晨，中村终于得出结论：不能扩大。

下午，参谋本部的回复电报也来了，与中村不谋而合。

两份命令都到了尾高手上，却是负负得正：不能扩大加不能扩大，等于扩大。

尾高并不是无脑，知道违抗上级命令是什么后果。不过他同样清楚另一个历史经验，那就是如果你赢了，即便背道而驰也没什么了不得，相反，一不留神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。

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。一直以来，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，也没见上面拿它怎样，反而是“九一八”的冒险成功，使这个原本只属于警备性质的驻屯军炒热了名气，并一步步走向“辉煌”。

显然，赢才是关键，抗命是其次。

可是苏军毕竟不同于张学良的东北军，中村为此焦虑了一夜，尾高也思考了一天一夜，都在想有没有赢的可能。中村认为没有，尾高则认为有，让他坚定信心的事例，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“干岔子岛事件”。

时间往回倒转一年，同样的情景曾经出现过一次。这个干岔子岛也属于“界限不明地区”，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士兵率先在岛上登陆，将其据为己有。

关东军所属第1师团奉命前往。三艘苏联炮艇见到后高速逆流而上，对着岸上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。日军立即还击，当场击沉击伤炮艇各一艘。

事后，第1师团连岛都不用登，苏联就同意“恢复原状”，并撤走了部队和炮艇。

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服软？日本军部对此作出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：被打疼了呗。一共三艘炮艇，一沉一伤，你想他们还能怎么办？

自从日俄战争之后，日苏基本没有什么直接过招的机会，“干岔子岛事件”给日军留了一个教案，这个教案上说，苏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，一旦出现边境纠纷，只要你果断出手，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。

早在重光葵出面与李维诺夫交涉的时候，日军内部就议论纷纷，认为单纯交涉不会有结果，必须得像“干岔子岛事件”那样，先打到苏联人疼，李维诺夫才会做出让步。

重光葵的交涉失败，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教案，即“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”。

尾高正是这一教案熏陶出来的孩子，那种急功近利对极了他的胃口，而相对于第1师团，第19师团在训练中一直以苏军为假想敌，都练这么多年了，若是比比画画，怎么也不可能被第1师团给甩下去。稻田说第19师团是与苏军作战的最佳种子选手，并非信口乱捧，其中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。

尾高拳头一握：“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，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！”

尾高把正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，并且决定当晚就部署进攻，他让作战参谋通过电话向中村作了报告。